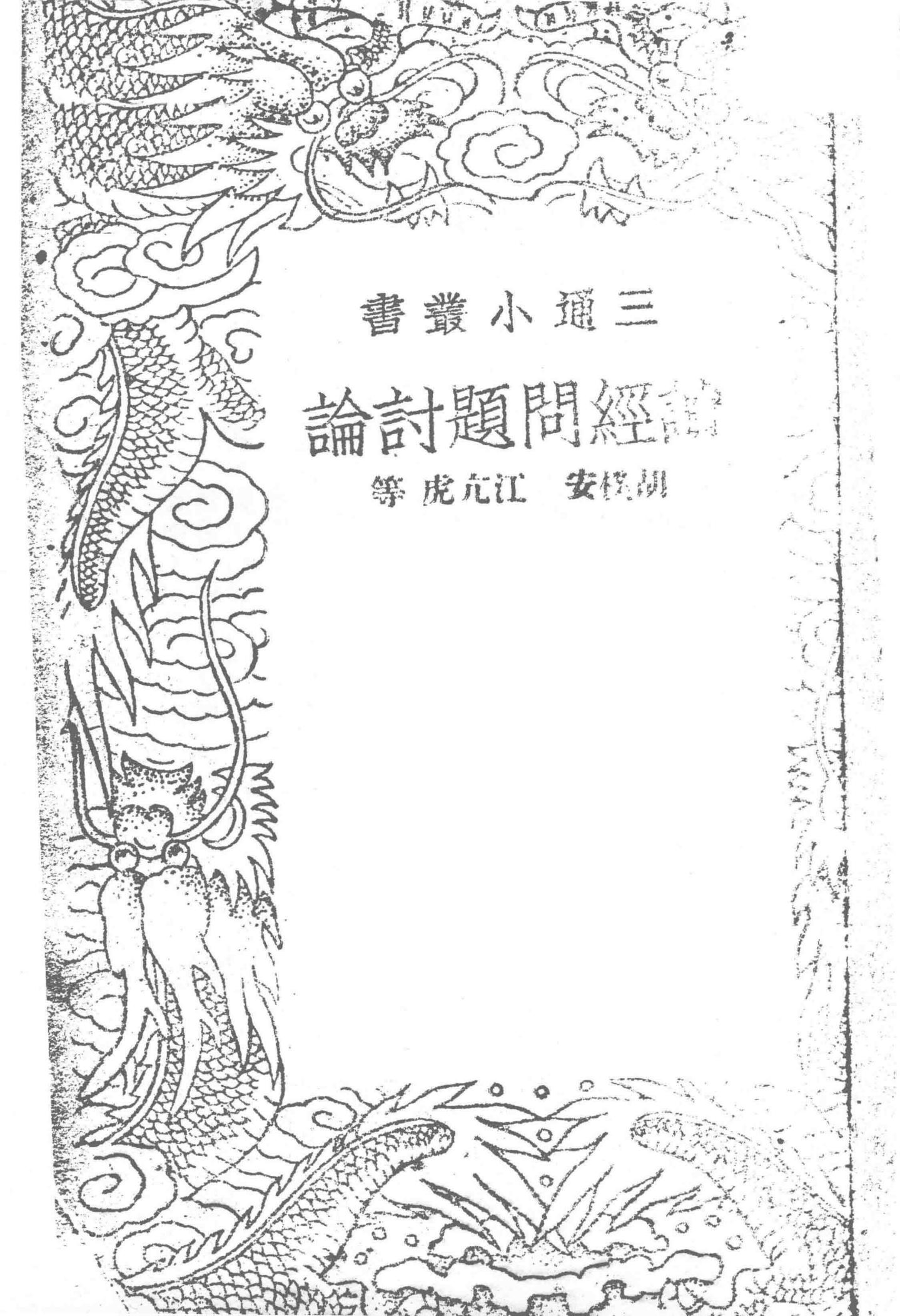


書叢小通三

論討題問經讀

等 虎尤江 安樸胡



書叢小通三

論討題問經

等 虎亢江 安樸胡

中華民國廿八年十月初版

讀經問題討論

定價每册

外埠運費匯費照加

編輯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
發行者 上海三通書局

大連灣路七二九號

門市部 四馬路中三三一號
南京朱雀路八〇號

杭州新民路三四五號

分 市 部

新 京 興 安 大 街
南洋新加坡及全國

各 大 城 各 大 書 局

三 通 書 局 營 業 要 目

學校課本

運動器具

中西文具

各種掛圖

機關用品

教育用品

繪圖儀器

兒童玩具

中西書籍

風琴樂器

雜誌刊物

各種地圖

本局小圖書，為便利讀者，每冊起見，
特分類編列於目，並以封面紙色為之，
內容區別。敬請 注意。

一、粉紅色(二二〇一—二二〇)

現代文學(小說，隨筆，外國文學)

二、天藍色(二〇〇一—二二〇)

古文學

三、淡黃色(三〇〇一—二二〇)

自然科學

四、鵝黃色(四〇〇一—二二〇)

哲學・宗教
教育・美術・歷史

五、淺妃色(五〇〇一—二二六〇)

社會科學・法律
社會・政治・經濟

發刊旨趣

本局乃中國出版界新起的挺進隊，肩負着文化的使命，紹介當世的學術；而尤注意於現實的需要。這小叢書的發行。是本局小小的一個供獻。今請一述其發刊之旨趣。

是不容否認的事實，世界進步到今天，在中國，一般知識的傳播，通常學問的享受，多半還限制於小資產階級以及刀得都會唾餘的農業社會裏；佔着極廣漠的場合，以環境上的許多問題，沾潤不得一些一般所能享受的文化上的幸福。把文化送到大眾的腦子裏去，這問題固不是單純的，但，出版上的問題，至少也解決了這問題的一半。以最精湛的

內容，由極便宜的物質代價作交換，讓大眾的大眾去領略，去欣賞，在普及文化的使命上，總不致毫無收獲罷？

固然，小叢書之發行，在本局之前，已數見不鮮；但，似乎有一通病，即取材方面，總難免「削足就履」。本叢書擬盡可能，力矯此弊，必以一種題材成一完整之單位，務求達到「小中見大以一概餘」的目的。

至於取材性質，初無限定，文·哲·軍·政·科學·經濟，罔不包羅；蓋欲於「大眾」二字上求澈底也。海內高明，尚希明教。

讀經討論

讀經的意見

讀經

讀經問題，在國內一般人看來，都早已不成問題。因為一部分人以爲經書是一千年前的舊書，到現在已用不着再讀，讀經就是開倒車，還成什麼問題。同時在另一部分人看來，經書是我國先哲的心傳，不朽的傑作，值得我們多讀，叫青年人去讀一點聖經賢傳，還成什麼問題。讀經一事，雙方既都認爲不成問題，各執一說，不肯相下，於是乃真成爲一個重要的問題。其實所謂讀經，假使當做一種專門研究，讓一班專家去下苦工夫，本不成問題，現在所以成爲問題，就是因爲有人主張中小學生都應讀經的這一點。

照我的觀察，中國人的思想，幾千年來，都是在儒家的勢力支配之下。原來自從漢武帝表章六經，罷黜百家以後，我國思想就已定於一尊。雖則從歷史上看來，儒家本身從很

早的時候就已有了派別：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便顯然不同；漢儒重訓詁，宋儒明義理，其方法亦大異。宋儒中間又有朱陸異同，明代王學又與朱學異趣，有清一代，康雍乾三代都竭力表章宋學，而學者卻趨重漢學，同屬儒家，已不一致。然於儒家思想支配人心一點，毫無妨礙；或者可說正因有這些不同的爭辯，反使儒家思想更能深入人心。至於漢初的黃老之學，迄魏晉而未衰；六朝隋唐，佛學極盛；皆是與儒家分庭抗禮。然而整個社會還是有形無形的受着儒家的思想的支配。所以我們可以斷言，那時中國是有一種中心思想的，就是儒家思想。

自從海禁大開，和西洋思想接觸以來，這個中心思想便漸漸被搖動了。甚至保守色彩極濃的張之洞也不能不主張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。」來妥協調停。直到民八，有一個新文化運動起來。這個運動在破壞方面確奏大功；而在建設方面却是毫無成績。固有的中心思想是被摧毀了，而新的中心思想却未曾建立起來。弄得大家都徬徨歧路。同時外來的思想又是很混亂的衝了進來，左邊從布爾雪維克起，右邊到法西斯止，真是五花八門，應有

盡有，同時大家又不肯埋頭的去下一番研究的工夫。於是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益發教人茫然無所適從了。我國現代青年的煩惱，就是這樣形成。

我們現在很榮幸能够得到國內各方面專家的指教，承他們在百忙之中，把他們的高見寫出來寄給我們，貢獻給讀者。

有一點，這裏各家的意見中，大體都是一種平心靜氣的討論，沒有一個說盛氣凌人的感情話，這是一件很可喜慶的事，編者在此特提一下，表示我們對各位專家欽佩和感激的微意。——編者

論

陳鍾凡

我國自有教育以來，即以經籍爲課本。但歷代讀經的方法，彼此懸殊；其目的也未盡從同。我們現在要討論這個問題，不能不先將歷代研究經學的歷史檢討一下。

一 讀經的起源

孟子說：『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。』夏殷學制，今日實無可考；周代教育，據小戴禮記王制篇說：『樂正崇四術，立四教，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。春秋教以禮樂，冬夏教以詩書。』是以四經立教，起原於周代。但王志是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的（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說。）其一說未必就是事實。周代教育是否限於詩書禮樂四者，實不得而知，未可據後人之說來武斷。周官『保氏教六書，大師教六詩』的話，更是晚出之書，不能據為事實了。

我們確知依經設教的，始於春秋末年儒家的孔子。論語說：『子所雅言，詩書執禮。』叢書解者謂：詩書禮爲孔子所常說，不言樂者，樂賅於詩禮之中了。四者又稱爲『文』或稱『文章』。論語所言『餘力學文』，『博學於文』，子貢所說：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』。解者皆以爲指詩書禮樂而言。故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說：『孔子以詩書禮樂教，弟子蓋三千焉。』後來莊子天下篇也說：『鄒魯之士，多明詩書禮樂。』又說：『詩以道志，書以道事，禮以道行，樂以道和，易以道陰陽，春秋以道名分。』於詩書以外又增易春秋兩書。

，經的範圍加廣，其天運篇述孔子對老聃說：乃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。讀經始於鄒魯的儒者，是毫無疑義了。試問他們爲甚麼要以六經爲教呢？看論語上既說：『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。』又說：『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』可見得他們研治詩書，目的在復興禮樂。因孔子當春秋末年，典型的封建制度業已崩潰，諸侯互相吞併，社會秩序紊亂，人民生計窮蹙；他以爲非恢復西周舊制，不能挽回這個局面。詩書是舊典章制度的紀錄，禮樂是舊文化精神之所寄託，故根據它爲教育的工具。後來荀卿發揮這種教育的精神，其勸學篇說：『學惡乎始？惡乎終？始於誦經，終於讀禮。禮者法之大分，類之綱紀也。』申述孔門教育宗旨，最爲明顯。這是我國古代經學教育的起原。

二 漢代的經學

秦人統一後，採統制文化政策，下令全國：『非博士所掌，天下有藏詩書百語者，悉詣守尉雜燒之。』不准民間自由選讀，祇由博士作專門研究。漢高祖劉邦於馬上得天下，他本來不事詩書；及天下既定，叔孫通爲他制朝儀，他才驚歎不已，說：『吾今而後知皇

帝之貴也！」陸賈又奏新語，時善其說，知到儒學實在有利於維持政權，於是過魯以太牢祭孔子，喟然興學，天下由此嚮風。到惠帝除挾書之律，文帝廣獻書之路，經籍方復顯於世。武帝依董仲舒之說，罷黜百家，特別推尊儒術，延文學儒者以百數。孔臧等議：恢復三博士舊職，並爲博士置子弟五十人。此時通經的人，大則可以充博士，小之可以當博士的弟子，皆有了出路了。公孫宏又奏請：『選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，補左右卒史。大行卒史。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。皆各二人，邊郡一人，先用誦多者。』漢人以六經爲六藝，這班博士子弟秩比二百石以上，或百石以下的，能通一藝就可以補內史，卒史等職，又儘誦得最多的人先補，在這種獎勵之下，誰不競爭，大家拚命來誦經呢？宣帝又擴充博士弟子學額，增加到百人，元帝更增加到千人，成帝增加到三千人。平帝時，王莽於常員之外，又增元士之子，得受業如弟子。歲課甲科四十人，爲郎中；乙科二十人，爲太子舍人；丙科四十人，補文學掌故。這皆是通經的出身。（以上見漢書儒林傳）後漢光武中興，立五經博士，各以家法教授。易經有施氏，孟氏，梁丘氏，京氏四家，尙

書有歐陽氏，大小夏侯氏三家，詩分齊，魯，韓，毛四家，禮分大小戴兩家，春秋分嚴氏，顏氏，共爲十四博士。經學至此派別紛歧與孔門的舊說已不知相去多遠了。章帝建初中（公歷七六一—八三年）詔高才生受古文經，雖不立學官，皆擢高第。爲講郎，給事近署，順帝更修黌宇，凡建造二百四十房，千八百五十室，試明經，下第補弟子。增甲乙科員各十人，除郡國耆儒，皆補郎舍人。後來遊學增盛，到三萬餘人。（以上見後漢書儒林傳）統觀兩漢學制，以六藝爲中心。凡通一藝的，可由博士弟子員補卒史，郎舍人等職，儒生皆以此爲進身仕途的階梯，無怪當時經師以千百計，著主以萬計，班固說得好：『皆利祿之途然也。』這是漢代經學教育的成績。

三 唐宋以後的經學

隋唐施行科舉制度，以經學爲考試的標準。唐太宗乃命儒臣孔穎達匯萃前人的章句爲注作疏，乃有『正義』之名。其易經用王弼注，書經用偽孔安國傳，穀梁傳用范甯注，論語用何晏注，這種去取失當，本無待言。高宗永徽四年（公元六五二年）頒行天下，每年

明經依以考試。從此說經者篤守御定的官書，隋唐以前的經師舊義也盡歸廢棄了。後賈公彥爲儀禮周官作疏，徐彥爲公羊作疏，楊士勛爲穀梁作疏，皆遵用孔氏故例，執守一家之言。例不違背舊注。及宋代孫奭疏孟子，邢昺疏爾雅，論語，孝經，也沿用這種辦法，以空言相演，與講句之學無異。然因爲考試可以獵取功名，大家兢兢業業的惟正義之說是從通，不敢與之立異。這是科舉時代的經學。

到了宋代歷慶以後，風氣稍變。劉敞著七經小傳，始異前儒之說。王安石修三經新義，多本敝說。從此新進後生，競尚新說，好爲懷疑。歐陽修乃排斥易經的繫辭，張載疑今文尚書，王柏疑詩及尚書中的洛誥，大誥，朱熹從小戴禮記中分出大學中庸兩篇來，又移易大學的篇章，強分中庸的章節，吳澄著禮記纂言，顛倒篇次，割裂章句，他們疑經不已，至於刪經，改經，這種大膽的研究法，比漢唐人自由得多了。然而宋人的經學，大概多尚空談而忘徵實，舍故訓而尚義理，皆以『六經爲我註脚』。所謂：『六經註』，不是『我註六經』。其結果祇能叫做『理學』，不能叫做『經學』。而王安石創『經義』體，

實爲『八股文』之起原。元仁宗時，王克耘因之，造『八比』一法，從此言經者盲目的拘守傳註，敷衍成文，其形式愈工內容愈空洞，學風愈趨頹廢了。

明太祖洪武初定制，用『制義』即八股文試士，乃以易詩書禮記春秋爲五經，大學中庸，論語孟子爲四書。其解經：易用朱熹本義兼程氏易傳，詩用朱子集註，禮記用陳浩集說，春秋三傳外用胡安國傳，四書用朱子集註，一切惟宋儒程朱之學是守。他的意思並不是真正提倡經學，不過是借宋人拘執之說，以錮蔽一世的人心，消弭其不平的志氣而已。

至成祖永樂十二年（一四一四年），敕胡廣等修五經大全，頒行天下，多襲用元人的舊作。春秋全襲胡克寬的胡傳纂疏，詩用劉瑾的詩傳通釋，易割裂董楷董貞卿胡一桂胡炳文四家的書，鉅訂成編。書傳勦襲陳櫟的尚書傳纂疏，陳師凱的書蔡傳旁通，禮記用陳浩的集說。四書大全則因倪士毅四書集釋稍加點竄，初與五經大全並頒，而當時程式，以四書爲重，五經多置之高閣，考試惟重四書，經學的範圍更加狹隘。一時風氣，萎靡不振，真是舍傳註以外無思想，鈔襲以外無文章，惟趨認考官的意旨，博取朝廷的微名而已。學風之

敝，還有甚麼可說？清代科舉，仍襲明人舊套，又把五經大全改編爲御纂周易折中，欽定書經傳說彙纂，詩經傳說彙纂，春秋傳說彙纂及三禮義疏，其內容之簡質固陋，視五經大全如同一個模範鑄成的。其四書祇用朱註，沒有『欽定』其他的本子，或『御纂』甚麼東西，而『高頭講章』一類的書籍，如四書味根錄，四書直講等，層出不窮。一般學子寢饋於其中，朝夕揣摩，不知到有多少意味！他們幾疑惑天地之大，古今之久，舍此別無學問，別無文章。我生雖晚，在清世光緒末年，尙親見那班迂腐固執的學究，搖頭擺腦，朗誦八股文，音節鏗鏘，直令人神魂飄蕩！現在那種書籍已不可多見，恐怕那種冬烘的頭腦，尙留傳於學界，還想來自誤誤人呢！這就是科舉時代的經學。

統觀上段所述，由唐宋下到明清，一般學人讀經，皆志在獵取科名，視漢人「明經志在青紫」，同一用意，與經學本身是毫無關係的。我們不要因此就把五經一筆抹煞，說它毫無價值。這又是應當申明的。

四 清代經學

前述孔門治經，爲維持禮制；漢人治經，爲補卒史舍人；唐宋以下人治經，爲應科舉博取功名。他們的目的，雖彼此懸殊，未可以道里計；然而同屬於主觀研究一派。若以客觀的方法來研究經學的則爲清代的經師。清代時康熙乾隆兩朝，大興文字之獄，一般學者咸箝口結舌，不敢講學，轉而致力於經術。其治古文經學的約分吳皖兩派。吳派以元和惠棟爲代表，他們鷙守，古訓少下己見，長於蒐輯遺文逸經。但以信古太過，至於不辨是非，惟漢人是從，所以大家名之爲『漢學』。皖派學者如戴震等治經，則以聲韻文字爲基礎，典章制度爲條貫，旁及歷數，水地，義理，莫不融會貫通。復不敢苟信古書，辨難析疑，匡違補缺，乃使古經之象大明。其學非漢人所能賅，實古典的考證學之先導。計他們有功古籍，約有四事：第一是辨訂僞經。如閻若璩辨證古文尙書及孔傳之爲僞書，胡渭張惠言力闢宋人圖書之紕謬，使各項傳會之談，至是無立足之地。第二是校勘錯誤。如王念孫的讀書雜誌，及其子引之的經義述聞，皆能考訂羣書，折衷至當。阮元的校勘十三經，將經籍中譌奪之文，悉加訂正。第三是創通義例，如王引之的經傳釋詞，講明經傳語詞的用